

# 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状的思考\*

汪行福

【摘要】国外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重思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奠基阶段；以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不同理解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化阶段；1968年之后在各种新社会运动基础上出现的各种思潮。当代马克思主义要有效地介入现实并展现其理论价值，就必须在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加以扩展，不仅要考虑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等核心因素的作用，而且考虑现代性中生态关系、性别模式、族性模式、文化系统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二是不仅要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劳动和生产解放的核心意义，而且意识到性别平等、自然解放、社会团结、价值认同和个体独特性等新的社会要求的合理性。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 社会批判 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 B0-0

## 一 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简要回顾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学界使用最多的概念，后者是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概念，前者是中国学界特有的概念，即中国之外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称，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十月革命后独立于苏联和西方政党而发展出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卢卡奇、柯尔施等的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上等同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与改革开放同步，国外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迄今已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首先，它的引入打破了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为新时期思想解放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刺激；其次，国外马克思主义著名思想家和不同流派的新理论、新视角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内容，提升了它的学术品质，吸引了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加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最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诸现实问题的研究，为中国现代化的自我反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可以说，近四十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最为繁荣的领域，具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特别繁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是，在西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15ZDB013)的阶段性成果。

除了罗伯特·戈尔曼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1985)、雅克·比岱等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辞典》(2005)<sup>①</sup>,并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在中国,自20世纪就出现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系统介绍的著作;进入新世纪后,成果更为壮观。鸿篇巨制有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中下三卷,2010)、陈学明等著的《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2012)、孔明安等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2012)、陈学明等编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四卷本,2013),这里还未把一些篇幅较小的著作包括在内。这种现象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其二,紧跟最新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贴近前沿。20世纪国内学界主要研究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和主要流派,今天该领域的研究已全面开花,每年有大量博士论文和专著问世,许多出版社都有这方面的译著或研究丛书,几乎每一个思潮、人物和著作在中国都有翻译和介绍。为跟踪前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每年还编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年开始)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2016年开始),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和国内研究的最新进展。

其三,研究机构日益壮大,特色越趋明显。有些研究机构起步早,研究力量较强,研究较全面,如复旦大学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等;有些机构相对晚些,如中央编译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除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许多大学都有相关的科研团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研究,如黑龙江大学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武汉大学的卢森堡思想和北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山西大学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等。

第四,中国开始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中国学者走出去参加各种大型马克思主义学术年会和论坛,如法国巴黎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英国伦敦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和“马克思主义周”、美国纽约的“左翼论坛”和《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近年在中国也开始举办较大规模的活动,如北京大学连续召开了两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南京大学也举办了多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

但不可否认,这个领域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些研究缺乏批判分析,介绍多、研究少,求新求异;为了突出自己的文化资本,对自己的对象作不切实际的评价;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目的性不强,对研究的价值还比较模糊;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如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划界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思潮之间的区分和联系问题。

## 二 如何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

一种理论的发展史必然涉及它的使命及其依赖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生存与发展有三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吸收和消化时代文化和知识成就,形成合理的人类自我理解和历史解释的知识纲领;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现实提供合理的解释;以社会斗争来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就此而言,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知识背景的变化,二是社会现实的变化,三是斗争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它是社会变动的感受器,另一方面它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因此,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的核心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起源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

<sup>①</sup> 该书原名是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应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指南》。

的自我意识，并主张从无产阶级实践状态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变化与发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843—1848年是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参与革命斗争和进行哲学观念的批判创立了自己的理论。1848—189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由于革命处在低潮，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从事理论研究，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和历史规律，为未来革命作准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工作重心的改变却在他的第二国际追随者中产生了误解，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与革命实践无关的纯粹理论知识。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之后，在这一阶段中，阶级斗争和革命重新成为主题，理论与实践关系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显然，柯尔施理论侧重于外部条件的变化，虽然这一研究方法成了撰写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的标准模式，但有一定的片面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影响它的外部条件，还应该考虑特定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理解和他们的理论生产逻辑。基于此考虑，笔者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应该分为三个时期。

### （一）重塑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西欧革命的失败使正统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为拯救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不约而同地反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旧正统，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作为自己的任务。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此稍加解释。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其自身任务的理解上有左、中、右三派。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其发展将自发地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构成了第二国际中保守的右派。卢森堡认为，伟大导师预见的时代已经到来，渐进变化将让位于革命，她主张马上发动大罢工和起义，这一思想代表着第二国际中积极的激进主义派。考茨基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他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矛盾，但并未出现革命的形势。因此，党的任务不是组织革命，而是为了革命作组织准备。这一消极激进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被看作正统。正统马克思主义虽然一度占统治地位，但在20世纪初就遭遇到了历史性的失败。一方面，十月革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在理论上已经破产了；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没有坚持将战争转化为革命的战略，而是接受了民族自卫理论，在政治上陷入破产。正如布洛赫所说“马克思主义恰恰在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在当时决断的现实中，在支配未来的现实中，证明自身的可靠性和有效性。”<sup>①</sup> 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已经失败，它的正统性就必然受到怀疑。

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明确指出，即使新的研究和历史发展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论点，仍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照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sup>②</sup>。他主张回到黑格尔传统的历史性、总体性和辩证法原则，把主客体相互作用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意识理解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明确把正统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解和堕落形式。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恢复总体性思想原则和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布洛赫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革命的首要因素是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革命激情。在他看来，现实不是一个封闭的实在整体，而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相互交织，“哲学乃是进步性总体的进步性意识，因为这个总体本身不是作为事实存在，而是在巨大的生成关系中尚形成的东西打交道。”<sup>③</sup>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带来明确的新正统

①③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345页；第341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47—48页。

意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不是因其现成理论，而是它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意识，因此，“‘正统的’观念需要加以更新并把它带到它的真正源头上去”。<sup>①</sup> 如彼特·托马斯所说“正如葛兰西所主张的，政治实践的自主形式的发展是社会阶级从隶属状态中脱颖而出的必要因素，因而哲学的变革和独立的世界概念的阐述，可以看作塑造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其行动能力的不可避免的因素。”<sup>②</sup>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语法，它把政治与哲学视为内在相关的两个领域，在它们之间进行穿梭和相互翻译，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摆脱了狭隘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也摆脱了思辨形而上学和非现实性。

以上讨论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其特殊背景和理论意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要求确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意识。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理解，赋予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理论以鲜明的特点：首先，他们主张回到理论源头，把总体性的思想方法和革命实践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大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其次，为了回到源头，马克思主义必须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路线，回到强调历史总体性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黑格尔哲学。最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那里，马克思主义不是与实践无关的纯粹理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必须结合起来思考。显然，这些特征的组合是不可复制的，因而应该将其视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个独立阶段。

## （二）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与第一代“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这一阶段以“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其代表人物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也主要在大学任教，既没有身临其境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感，也没有重塑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思想抱负，他们更多地把精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解释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潮，如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从非马克思主义那里借鉴思想资源，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它们结合到一起。如萨特，他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人学的空场，需要用人的存在概念加以补充，并用个体生活史的前进-回溯的精神分析方法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阿尔都塞也一样，他的理论不能简单化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主张，而更重要的是，他试图以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来补充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终极决定论和线性因果关系的分析。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突出特点莫过于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化。自阿尔文·古德纳(Alvin Goudner)的《两种马克思主义》(1980)出版以来，这一分化已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黄金时代的特点。解释这一特点的直接因素不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状态的改变，而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思想对立和矛盾。其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化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有其根源。正如布洛赫所说，马克思主义中既包含着追求理想的“暖流”，也有追求严谨冷静分析的“寒流”。<sup>③</sup>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核心因素，一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受客观矛盾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强调人类历史为阶级斗争的过程。这两个方面构成马克思思想形象的不同侧面，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把它们加以强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58页。

② Peter. D. Thomas, *Gramscian Moment: Philosophy, Hegemony, and Marxism*, Brill, 2009, p. xxv.

③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245—246页。

化，变成了相互对立的思想方向。如何看待这种片面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笔者的看法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都采纳一种哲学，都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自己的由来，并且探究其理论和实践结论。”<sup>①</sup>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有其消极后果。人本主义的特征是理论的情境化和历史化，这一倾向容易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确定性，把它稀释为泛泛的文化批判。科学主义的问题是过分相信历史的客观逻辑，往往对社会现实的变化无动于衷。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转折点是1968年学生运动。在这一风起云涌的变局中，当时最显赫的人本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和科学主义思潮结构主义都暴露了其致命缺陷。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成了哲学的概念游戏，当其与现实运动相遭遇时，马上陷入茫然无助，导致学生对他的失望。同样，一句“结构不上街”充分暴露了结构主义政治上的暧昧，导致人们对它的不满。

###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

1968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分水岭，一些流派逐渐淡出，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一些流派发生了转型，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但当今最有影响的思潮，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族性马克思主义（racial Marxism）、后殖民理论、世界体系论等，都是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命题可作广义和狭义理解。广义上，在复杂变动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一定是多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拉塞尔·雅柯比就认为“在每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都带有它特有的环境的特征。单一的、同质的马克思主义属于过去。马克思主义时常有着它的背景条件所带来的色彩和内容。……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均是独特的，有其自身的历史、文本、领导人、成就和问题。”<sup>②</sup> 《“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的编者戈尔曼也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就像一块五彩板，它是由不断修饰自己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估，充满希望地审视和理解未来的各式各样的并且是彼此冲突的理论构成的。”<sup>③</sup> 2008年英国《历史唯物主义》年会明确把它的主题定为“多种马克思主义”（many Marxisms）。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被理解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现象。

但笔者想强调这一命题的特殊时代意义，视其为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特征。1968年学生运动是战后西方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它使前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陷入困境，但也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具体来说：（1）1968年学生运动导致西方文化的普遍激进化。表现之一是人们以往对精英主义大学体制和学术体制的不满，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激进批判特征自然对学术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在此之后，影响扩大到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等学科。影响的扩大也意味着更多的理论视角被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出现各种理论转向。（2）1968年学生运动也是西方社会政治的激进化。这一时期出现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新生活方式运动等，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当代社会，并提出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如世界和平、种族平等、生态保护、性别平等以及生活方式个性化等。与前一阶段方法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同，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是社会运动导向的，即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的结合，出现了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新思潮。（3）1968年学生运动带来了学术研究体制的变化。新社会运动暴露出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如城市、生态、性别、民族、宗教等，已经超出了以往的学科界限，需要进行综合性的领域研究（field studies），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技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后物质劳动的马克思主

<sup>①③</sup> 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李菱、邓玉庄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6页；第1页。

<sup>②</sup> Russell Jacob,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2.

义等。(4) 后现代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后 1968 年学生运动的思想运动。虽然它以“反宏大叙事的宏大叙事”的悖论形式出现,拒绝启蒙与进步、鼓吹历史终结论,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特征。但是,后现代主义中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思想因素,如拒绝历史目的论和必然性、反对同一性和抽象普遍性、强调理论的情境性和历史性等,这些方面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是新社会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的产物。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运动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些运动不仅分享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激情和进步要求,也必然会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的强劲影响,也使马克思主义走出自己的传统领地,关注性别、生态、地方性、文化等问题,以证明马克思不仅在“中心”,而且在“边缘”。<sup>①</sup>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和理论逻辑,它既没有第一个时期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正统性情结,也不像第二个时期的理论家那样热衷于深奥的哲学问题,但第三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问题入手,立足于新社会运动,进一步释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潜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 三 如何看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如何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如何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学界有很多讨论。张一兵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不包括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那些直接模仿、照搬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在他的解释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迁是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和各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sup>②</sup>董世骏借鉴科学哲学的概念,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分为“内核”和“外围”,“内核”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就放弃了理论,但“外围”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在他看来,对理论与实践、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是“内核”,而否定“内核”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逻辑矛盾。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外围”应该尽可能放宽。只有把“外围”适度放宽和坚守内核结合起来,才能既避免丧失立场,又避免思想僵化。<sup>③</sup>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特点,正确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核心问题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关系问题。当代思潮当然有自己的问题域和规范诉求,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家族的成员,它们之间必须有“家族相似”。如何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进行划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需要确立合理的分析坐标和理论框架。笔者认为,是否以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现实,是否按马克思的解放意图来改变世界,可以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坐标。

从经典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本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带着解放意图的社会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意图有否定和肯定的两个表达式,前者是“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④</sup>;后者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⑤</sup>。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可理解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原则是: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

<sup>①</sup> 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sup>②</sup> 参见张一兵、周嘉昕《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39—44页。

<sup>③</sup> 参见董世骏《当代马克思主义:坚守“内核”放宽“外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30—36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sup>⑤</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

正如阿隆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人对环境负责，如果环境剥夺某些人的被认为过一种体面生活所必需的手段，那么人必须改造环境。”<sup>①</sup>在此，任何一种理论当其能够把自己对社会的唯物主义批判与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对人类支配和统治关系的分析和批判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对人类解放的内涵做出实质性的新的理解时，它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而也就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家族。

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可以历史地理解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理论视域的扩展。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评估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在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层面上，经典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核心，把劳动分工、财产结构、生产关系和商品社会等看作阻碍个人自由发展的系统化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关系，理解为应该改造的环境因素，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批判的范围必须大大扩展，深入其他领域。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生态危机的原因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利润动机，而且还有不合理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模式和及时行乐不顾后代的代际关系。当一种生态主义理论不割断自己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和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联系，同时又以其对资本主义因素的批判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批判内容时，它就是唯物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后殖民理论表面上看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无关，因为它针对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文化强制。但实际上，即使不考虑文化霸权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仅就一种文化解释和评价体系把自己系统地强加给其他文化并在民族文化之间制造不平等关系而言，它就是一种系统的物质强制力量，对它的批判同样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分析和批判。对人类生活依赖的其他因素的分析也是如此，族群关系、土地、空间、时间、资本、技术、信仰等当其受到系统的个人无法克服的力量和模式支配时，对它们的分析和批判就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即使它们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形式，它们也应该视为唯物主义批判理论联盟的成员。

在规范和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是以劳动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作为历史起点的，但今天这种理解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原则，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展现其具体意义和内涵。在这里，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在实质意义上推动了人类解放理想的自我理解，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以往理解的片面性，即使其内容超出劳动解放的范围，也仍属于规范和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不仅体现在它对现实社会的多维批判上，也体现在它对人类解放的多维解释上。实际上，马克思就指出，人类的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的满足也产生新的需要。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满足需要的变化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进步，都要求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范视野。当今马克思主义思潮反对生产主义、物质主义，要求把人与自然的伦理和审美关系、把情感和性爱的丰富需要、把文化的自主性，作为新的社会批判的动机和社会反抗的动力，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总之，面对五花八门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我们既不能无原则地接纳一切，也不能狭隘地根据已有理论加以排斥。真正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延长线上，而不是处在它的断裂线上。这样，我们既能正确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的积极意义，又不放弃对它们的批判和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猎新猎奇，对它的研究应该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哪些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内容，二是它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的理解可以给中国改革和发展提供什么样的积极思想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走出“野蛮生成”的状态，走向真正的自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强乃社

<sup>①</sup> 雷蒙·阿隆《论自由》，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144页。